

施奠邦:中国当代著名中医学家

崇明·历史名人

文/柴素熊



图为1992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首届科技大会合影

校,缺少进行系统学习的机会,不能完整地掌握医疗技术。为了改变这一遗憾,施奠邦萌生了要进高等医科院校学习的念头。通过自学,他于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在医疗系学习。

经过五年的学校生活,1957年毕业后,施奠邦被分配到了中国中医研究院附属西苑医院内科消化系研究室,从事肝炎、肝硬化、肝腹水以及其他消化系疾病的研究工作。西苑医院创建于1955年12月,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央人民政府建设的第一所大型中医医院,中医特色突出,中医人才济济,诊疗优势明显,在国内国际具有较大影响力,是集医疗、科研、教学、保健为一体的全国示范中医院。在那里,施奠邦凭借着自己的学术学识水平,历任室副主任、内科主任。再后来,由于他在医疗方面的成绩显著,又被上级卫生主管部门选中,进入中国中医研究院(现名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这是一家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直属的,集科研、医疗、教学为一体的综合性研究机构,是国内规模最大、学科齐全、设备先进、科研力量雄厚的中医药研究单位,拥有国家新药(中药)临床试验研究中心(GCP)、国家规范化中药药理实验室、中国中医药文献检索中心和BSL-3实验室,是国家中药安全性评价中心(GLP)与中药复方药物开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建设单位。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共同建立了临床与信息、针灸、中药三个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国针灸学会均设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心任务是中医药科学研究。50年来,中国中医科学院在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和重大疾病防治及中药新药开发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施奠邦在那里先后任副院长、院长。1982年5月,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施奠邦,就是其中的一个。

施奠邦出身于中医世家。他的父亲是当年岛上崇明纱厂医院的厂医。那时的纱厂医院是崇明东部地区最有名的医疗机构。该医院平时不但为厂里的数千名职工治病,同时也对工厂所在地堡镇的居民开放,为他们诊治常见病,动用一般的内外科手术。施奠邦的父亲在那里,专门从事中医内、外、喉科等诊治工作,其医术水平,在周边一带很有名气。施奠邦继承家学,很早就开始随父行医,18岁时已在纱厂医院工作。在父亲手下,施奠邦的医术水平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总觉得自己没有进过正规的学

在施奠邦担任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期间,中国中医研究院充分发挥中医医疗的优势和特色,为广大患者提供良好的服务,施奠邦针对当时针灸和中医骨伤科高级专门人才缺乏的现状,尽力筹备和建立北京针灸骨伤学院(后在2000年并入北京中医药大学),以适应国内外对这方面人员的急需。在北京针灸骨伤学院建成后,他又积极筹建以中医骨伤科学为重点的全国中医骨伤专科医疗中心——望京医院,解决了中医骨伤科治疗困难的窘状。鉴于西苑医院业务量日益增加,施奠邦又着手扩建西苑医院,添建了500张床位的病房楼,并在原中心实验室的基础上,组建起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加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各附属医院在肿瘤、心脑血管病、老年病、糖尿病以及肛肠、皮肤、泌尿等各科疾病及多种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重症的治疗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疗效,在国内外有较高的声誉。

中国中医研究院是培养高层次中医药人才的重要基地,现有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三个一级学科所涵盖的所有学科专业的博士、硕士授予权,具有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授予和在职人员申请学位的资质;设有中西医结合、中医学、中药学三个一级学科的博士后工作站。难怪直至现在,北京中医界的人只要一提起施奠邦,都会说他在担任中医研究院院长期间,为中医科学院的建设发展尽心竭力,劳苦功高,成绩值得后人记忆。

功勋卓著的老中医

施奠邦不但在创建中医的科学研究方面卓有成效,在几十年的从医经历中,也始终以忠诚服务患者为自己的信念。医院的同仁都知道,他对待病人无论位高权重的领导老板也好,还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均一视同仁。处处为病人设想,事事替患者分忧。当上领导后,在繁忙的行政工作和科研工作的同时,仍然始终坚持到临床第一线工作。在中医药治疗疑难病、多发病方面,施奠邦的诊疗效果显著,精湛医术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尤其是在他年逾八十高龄时,仍

不计报酬高低,按时应诊,甚至连续工作6-7小时而不休息。其高尚的医德医风,不仅受到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的尊重和爱戴,更受到众多患者的欢迎和赞许。

由于他医术高超,医疗作风严谨,经过卫生和外事部门的专门遴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施奠邦曾长期承担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任务。此外,他还受国家委派,赴印尼、越南、赤道几内亚、朝鲜、阿联酋等国家,为那里的政要担任医疗保健工作,受到这些国家领导人的赞扬和表彰,为扩大中华传统医学在海内外的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

多年来,施奠邦还承担了大量的临床教学任务。他先后培养了5名研究生,数十位朝鲜、越南、韩国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进修生,以及一批批来自国内医学院校的学生和进修生,数量达几百名。他曾3次到台湾地区,2次到日本进行讲学或参加学术交流,在日本第43届东洋医学年会上被邀作了题为“肝脏疾病的中医药治疗”的特别演讲,并在《日本东洋医学杂志》第43卷第3期上予以发表。他的中医学思想在世界上30多个国家中有很大的影响,为中医药事业后继人才的培养和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对于自己在中医学方面取得的成绩,他从不自满。在中医界,人们都知道施奠邦关于中医药是这样论述的:“不能说我们当前不能认识或理解的东西就不是科学,因为人类所能了解的还仅仅是一小部分。但对于与人性命攸关的大事,我们还是持小心谨慎、让疗效说话的科学态度为好。”

晚年,对于社会上某些人企图以伪科学手段赚取不义之财的应诊邀请,他坚决予以拒绝和抵制,清廉之风令人钦佩。2003年,施奠邦经熟人介绍,于8月成为北京新兴医院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说是顾问,他并不是像有些人只挂名拿钱而不干事情。他坚持每个周六到医院坐诊,主要为不孕不育及少数肝病、肿瘤患者诊治。当有人问起施奠邦治疗不孕不育症有无绝对把握时,他也从不忌讳,总是如实地告知,说自己是个老中医,什么病都能看,不孕不育症也可从中医论治方

面去做诊治,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治好过不孕不育的病例。这样的回答体现了他的实事求是精神。在新兴医院任顾问期间,施奠邦一直不满意医院的医疗广告,做得太多太滥。他曾跟医院相关人士作过交流,说是与其花这个钱用在广告上,还不如用来搞一些学术会议,邀请全国各地的专家前来,交流切磋学术经验,提高诊治水平。见自己多次建议无效后,施奠邦认为医院如果单纯地以赢利为目的,便背离了以病人为上的宗旨,在2004年7月,他辞去了医院顾问的职务,并表示今后再也不会返回来。果然,一个月后,上海《瞭望东方周刊》刊发了一篇题为《北京新兴医院巨额广告打造“包治百病”神话》的文章,对自称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医疗水平最高”、“专业医治不孕不育症的‘超级航母’”的北京新兴医院滥发滥登广告提出了质疑。随后,各大报纸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报道,该医院将网站上部分虚假内容作了更正。

施奠邦从事中医药工作前后达60余载。一个多甲子的医务生涯,让他在治疗多学科疾病、尤其是内科疑难危重病症方面见解卓越,造诣非凡。对《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著作,他更是有着精深的研究。在深入吸取古今医家的宝贵经验中,他用独到的辨证论治方法治疗病人,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建立了一整套有自己特色的科学诊治方法,疗效显著。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七十多岁高龄时,开始学习计算机技术,将研究和治疗方案输入,形成完整的记录档案,成为中医学的宝贵遗产。在晚年,他更是呕心沥血,花费10年心力,精雕细刻,主编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编著了《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儿科学》等书籍;撰写了“脾胃病辨证论治”、“中医肝病治法”等经典论文。为祖国中医学的继承和发展,施奠邦一生可以说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对当代中医学有着承前启后的重大影响。他一生勤奋治学,广博博采;他善于继承,勇于创新,无愧乎是学贯中西、德技双馨的中医学家。

本栏目由上海市崇明文史研究会供稿

孝老是福

中华有福



富民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敬业诚信友善